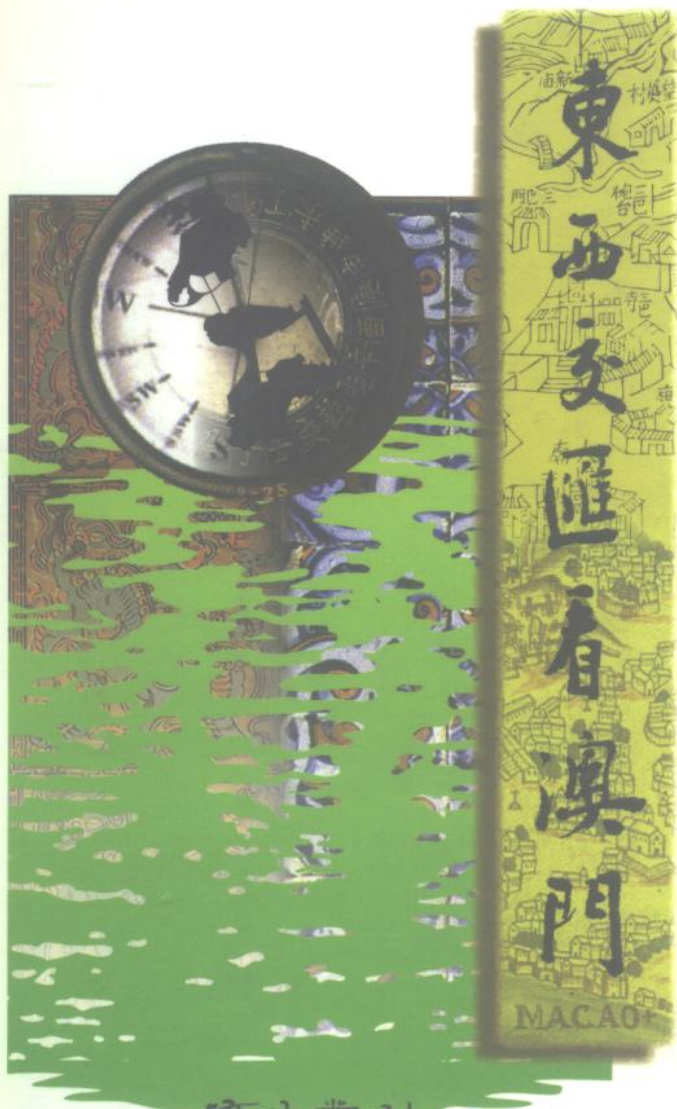


吳志良 著



濠海叢刊



澳門基金會 出版

吳志良 著



201039143

東西交匯看澳門

崔法祺



澳門基金會出版

吳志良主編

濠海叢刊

東西交匯看澳門

作者：吳志良

叢刊題字：錢君匋

封面題字：崔德祺

封面設計：李耀斌

助理編輯：姚翠玲

出版：澳門基金會（澳門郵政信箱3052號）

版次：1996年8月第一版

印數：2,000本

排版：新藝電腦植字排版公司

印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定價：澳門幣45元

ISBN 972 - 8147 - 89 - 9

¥59.-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DFH50/10

沙漠與綠洲

不認識澳門的人都說，澳門是文化沙漠。我們雖不認同此一觀點，但也找不到很有力的論據去反駁。去年底，我們籌備出版《澳門論叢》時，多少有點尋找論證去打破這種說法的意味。半年的工作，似乎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最初的想法，是在兩年內編輯出版一套十本的《澳門論叢》，作為對籌備經年的《澳門叢書》的補充和輔佐，但學術界對《澳門論叢》反應之熱烈，卻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僅僅半年的時間，我們便收到超過二十部書稿。有些論述性強些，完全可以納入《澳門論叢》；有些則資料性和資訊性強些，述重於論，但都頗具價值，與我們編輯《澳門論叢》的初衷並無二致。因此，我們決定設立《濠海叢刊》，與《澳門論叢》相輔相成，以吸納更多的作者，包容更多的題材，更好地達到研究澳門、推廣澳門的目的。

編輯這幾套叢書的過程中，我們也找到了更充分有力的論據，去反駁澳門“文化沙漠論”。然而，駁論並非我們的目的，也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工作的最終目標，是將發現的一個個獨立甚至孤立的綠洲，有計劃和系統地逐步聯結起來，形成一片，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們相信，一個有知識和良能的人，讀過這些書之後，慢慢會覺得置身於綠洲之中，“文化沙漠論”也不攻自破。

吳志良

一九九四年八月

序 言

鄧正來

吳志良先生所撰的《東西交匯看澳門》(以下簡稱《東西》),是一部學術隨筆的論集,而且主要是對凸顯中葡關係的澳門文化的思考。雖說我在研究過程中閱讀過一些關於澳門的文獻,但卻未進行過專門的澳門研究,所以本不應當為志良這本文集作序,然而事實是我對志良的提議做了欣然的應允。這是因為在我與志良的多次嚴肅的討論中,在認真閱讀他所撰寫的關於澳門政治發展的博士論文初稿中,在我訪學澳門與一些澳門學者的交流中,我似乎解讀出了《東西》這部論集中所隱含的理論意義以及由此可能提出的較為重要的理論問題;再者,該文集所論涉的澳門的地域雖小,但我卻沒有充足的理由認為其學術意義也小,因為經驗題域的學術意義大小,取決於我們是否可能從其間提出重要的理論問題。從學術的角度言,《東西》一書正是向我們提出了一些須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這些論題大體上涉及現代化的理論、近代中國的研究、文化間的交流和互動等問題。無疑,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當不能要求一本學術隨筆的論集給出系統且詳盡的分析和討論,並給出有效的解釋;但是一如我們所知,學術研究的關鍵雖在於各項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以及得出這些結論的分析過程,然而更為重要的卻可能是這些分析及結論所賴以為基的問題。志良《東西》一書的貢

獻,在我看來,或許就在於它為讀者進入澳門研究或中國研究時提供了一些極富理論意義的問題。

—

自西學東漸以來,源出於西方智識傳統並為西方啓蒙運動所推至極端的以“進步”、“進化”為核心觀念的發展主義邏輯開始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處於支配地位,其間影響至深且遠的乃是所謂的西方現代化理論。西方現代化思潮中的歷史觀(孔德、斯賓塞)、典型觀(Tonnies、涂爾干、韋伯等)以及結構——功能觀(帕森斯、列維等)都是“現代化框架”的理論資源。這些理論都以下述兩個假設為基礎:首先,當下世界的所有國家都可以根據西方現代化所取得的成就而被界分為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這便是人所熟知的“傳統—現代”兩分觀。套用 Theda Skocpol 的話說,“此一方法乃是細心建構‘傳統’對‘現代’的非歷史的理想類型,然後將其應用到國家研究的案例上。”其次,人類歷史注定沿着單一軌線發展,此一軌線由前後相續、性質嚴格區別的階段構成;依據上述“傳統—現代”兩分觀,這種發展就表現為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進化,一如 LaPalombara 所言,“‘現代’與‘現代性’這兩個術語意味着社會達爾文主義模式的政治發展,並暗示改變是不可避免的,且其進展具有許多明顯的階段,後來的進化階段則比先前的階段更複雜亦更美好”。

這種以“傳統與現代”兩分觀及“傳統必然向現代”的進化觀為思想支援的各種現代化理論,在本世紀 60 年代以後遭到了學術界的理論批判,這些理論上的批判至少可以被概括如下:第一,“現代

化框架”將世界各國做傳統與現代的簡單兩分處理，意味着不是現代的就必然是傳統的；這種武斷的非彼即此的處理，緊要處在於如何對現代給出界定，但是這一界定依據的恰恰是西方發展經驗及其成就中抽象出來的因素；據此，“傳統—現代”兩分觀具有着“西方中心主義”的蘊涵。第二，傳統與現代的兩分乃是經抽象而獲致的純粹形式，它使人們依據現實中並不存在的這種純粹兩極形式去構想世界，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以邏輯合理性替代歷史的真實性。進而，由於這種兩分觀忽視了經驗上的事實，甚或無視實證研究的重要發現以及人類學和歷史學上的知識，所以根本否定了現代中隱含有傳統、而傳統中又往往存在着現代這一極為複雜的現象。第三，“現代化框架”預設的那種一成不變的單線性歷史進化圖式，其背後的根本要害在於將西方發展經驗的偶然轉換成一種普世的歷史必然；它不僅意味着於目的層面世界須依西方已然獲致的成就水平向西方趨同，而且西方實現此一成就水平的方式亦具普遍有效性；這意味着對條件不同、文化相異的國家發展出具有個殊品格的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性的否定。第四，透過“傳統與現代”的歷史發展的前後序列排比以及認定現代化的實現以拋棄和否定傳統為條件，“現代化框架”進而在設定傳統是整體且同質的基礎上，視傳統為整體的落後，並且對趨向於現代的發展構成了障礙；這就意味着傳統社會必定要尋求現代，但同時必須整體地拋棄和否定傳統；這無疑忽視了傳統中所隱含的向現代轉型的深厚的正面性資源。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現代化理論雖說遭到了批判，但正面的經驗研究尚不多見；《東西》一書所提供的澳門社會發展過程，卻表明傳統社會方式及觀念在其間的重要意義。正是這個經驗問題的建

構，揭示出澳門研究在學術脈絡上所可能做出的貢獻：一方面可以從澳門的經驗研究層面對西方現代化理論做出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則可以透過正面的理論建構在澳門發展經驗研究中為社會理論提供出並不以否定歷史為前提的一種發展理論。

二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學術討論，除了分期問題以外，更主要地集中在“西方—中國”解釋模式所引發的討論中，這裡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在沒有西方的衝擊下中國自身是否可能進入近代化（或現代化）。若以支配性的解釋模式轉換的角度來看，這一討論基本上可以被劃分為兩個階段。在“傳統的停滯的中華帝國”論這一階段持續的討論中，論者立基於不同的問題結構而形成了大體上可以被稱之為三大學術解釋模式。簡而論之，一是在本世紀中葉以前，以 E. Balazs 為開端，繼而為西方諸多漢學家所提出的“士紳社會”解釋模式，該模式基本上認為，中國擁有一個在文化上同質的精英（即士大夫），他們同帝國緊密勾連，因此致使這一統治階級有了一種不曾斷裂的延續性；而他們所具有的種種保守性質也使他們成了阻礙中國實現技術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終使中國社會處於停滯狀態。這種解釋模式顯然以馬克斯·韋伯的中國觀為理論資源。二是以費正清為首的“哈佛”中國學派所提出的“西方衝擊—中國回應”的解釋模式，這種模式以韋伯以及從其理論中演化出的傳統與近代截然兩分的近代理論為依歸，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動態近代社會，而中國社會則是一個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傳統社會，其缺乏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祇有經過西

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衝擊，中國傳統社會才有可能在回應這種衝擊中逐漸擺脫困境，獲得發展。三是以中國史學界於本世紀五十年代初以後形成的“封建主義”解釋模式，此一模式主要以斯大林的五種生產方式的公式為理論基礎，認為歷代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基本上處於無變化的狀態；明清生產方式的特徵乃是家庭農業與小手工業的緊密結合，而這種生產方式阻礙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

上述第一階段關於“傳統的停滯的中華帝國”的論斷，經由種種原因，而在各自的學術脈絡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戰和批判。最早質疑上述論斷的，可能是中國史學界於五十年代初便提出而於八十年代又有發展的近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論點。這個解釋模式認為，中國社會在明清時期並不是停滯的，而是充滿着種種資本主義預兆的變遷，與西方國家的發展經歷相類似；而且，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自主性邏輯是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後才被打斷的。第二，“哈佛”學派的“西方衝擊—中國回應”模式在六十年代末期首先遇到了政治上的批判，此後又遇到了史實及理論的挑戰和批判，並以所謂“近代早期”的解釋模式起而替代。對於所謂“士紳社會”論的批判，由西方學界所提出的“地方史的研究進路”擴展並拓深；這些論者通過把關注點從國家控制或國家證成精英地位轉移到地方社會的精英活動面相，指出了中國的精英尤其是地方精英並非祇是所謂的士紳，而更包括那些依地方活動及財富等資源的不同形成的商人及地方強人等競爭性精英，而這些多種類型的精英間的變遷關係以及他們與國家間的複雜關係說明了近代中國精英並非那種同質性極高的士大夫，相反揭示出了近代中國社會中內在發展的動力。

雖說上述“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萌芽”的模式、“西方衝擊—中國回應”與“近代早期”的模式以及“士紳社會”與“地方精英”的解釋模式間構成了針鋒相對的論辯，而且每一論辯的後者都對前者形成了有效的衝擊，更在解釋模式的論辯中推進了近代中國的研究，但是，如果我們對其相同方面進行追究和反思，我們則可能發現它們有可能實際上依據的是同一個“規範認識”，一如黃宗智所指出的，由於“封建主義”及“西方衝擊—中國回應”模式都將“停滯”與前商業化相聯繫，而“資本主義萌芽”及“近代早期”模式更強調近代化與商品化的正面相關性，所以這些經濟史解釋模式的論辯中貫穿着同一個“規範認識”，即商品化會導致近代化。

極具意義的是，《東西》一書對澳門歷史發展特性的強調，恰恰可以促使史學研究者通過對澳門的切實研究超越上述論辯並對其所共同依據的“規範認識”提出強有力的質疑，因為澳門幾百年的商品化發展歷史，並沒有在本世紀 70 年代以前使澳門跨進近代化（即現代化）的門檻；不僅如此，更富理論意義的是，在這樣研究中，澳門的社會經濟研究甚至有可能建構出新的規範認識，為其他地方的社會經濟研究提供具有示範意義的研究範式。

三

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與上述討論頗具關聯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孰優孰劣的學術爭論。在中國與西方衝撞初始，由於戰爭的失敗而促使中國論者為尋求發展的目標而漸次在器物、制度及文化的層面進行反思和檢討，並在這種討論中確立起西方唯理性主義的“優生劣汰”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優越地位，

甚至是支配地位；由於種種原因，中國論者在 1978 年以後又重複了一百年前的同樣論爭，這突出表現在八十年代展開的文化討論中，結果依舊是在尋求發展的過程中以西方的文明漸次否定中國的器物、制度和文化。當然，在以西方文化否定或支配中國文化的多次大論戰中，另一脈的論者雖說始終處於“被支配”的地位，但是他們的主張卻也堅持一個邏輯，即中國文化才能救中國，並且是人類發展或未來的出路。後者的觀點隨着全球冷戰的結束、涉及人與自然關係的環境生態保護問題的提出以及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道德失範的普遍化，又逐漸處於顯勢：不論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的觀點，還是西方文明已走到盡頭、人類須從東方文化中發現出路的論點。我們如果不滿足對上述爭論雙方的主張做簡單的結論，而是對其相同的面相加以追究，那麼我們就會發現爭論雙方實際上遵循着一種同樣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即以一種邏輯替代另一種文明邏輯的思路：整體的一元觀。

然而，《東西》一書卻通過簡明的方式告訴人們，澳門的社會發展過程表明，無論是華人還是葡人，並沒有在他們和諧相處的真實生活中遵循那種“非此即彼”的一元文化觀，相反，華人和葡人卻在另一種多元且和諧的思維方式下使兩種在“文化優劣者”那裡本應發生替代的文化在澳門數百年的歷史中熔合共存。這個問題的提出，在澳門的歷史研究中就意味着既不能通過單向度的中國文化去尋求解釋，亦不能通過單向度的葡萄牙文化進行說明，而是需要進入具體的層面探究其文化的意蘊；此外，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問題有可能使我們在思考更大範圍的文化問題時否棄上述整體的一元思維方式，進而在文化多元觀的視界下推進文化微觀意義的具體研究。

* * *

毋庸置疑，對於學術研究而言，僅提出問題是不夠的，還需要更爲嚴肅且認真的研究，因爲祇有經過進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我們才有可能將上述問題提升爲有意義的理論假設，而且還須在具體的研究中對這些假設進行經驗層面的檢驗。然而，一如上述，問題及設問方式不僅表現出其背後的問題結構和思維方式，而且也會在一定的意義上影響對該問題的回答路徑和解釋模式；因此，希望讀者能在各自的研究過程中結合這些問題進行思考，以推進無論是澳門的研究抑或中國的研究的提升；當然，誠如哲學闡釋學所要求的“假定對方可能正確，假定文本可能說了些甚麼新的東西和我以前不懂的東西”的同情理解態度，讀者一定會在閱讀《東西》這本論著的過程中，根據各自的知識支援讀出更多的有理論意義的問題，並通過反思而在交流和討論中做出更具貢獻的研究。個人以爲，或許也是志良的想法，這就是《東西》論集的學術意圖所在。

1996年5月15日晨
於北京西郊寓所

目 錄

序言	鄧正來	I
從澳門看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融		1
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		
——以澳門小城為例		14
從澳門看文化發展戰略		20
澳門與中國近代史		25
澳門政制的演變與前瞻		29
舊話重提“澳門學”		37
澳門史研究述評		43
澳門歷史 雙軌單行		
——兼評施白蒂《澳門編年史》		65
傳統情意結, 新生史學觀		
——李志高《中葡與澳門問題》		68
站在超民族的地位		
——龍思泰及其《葡萄牙在華居留地史綱》		71
歷史的嘲弄		
——徐薩斯及其《歷史上的澳門》		75
鴉片戰爭前後葡萄牙尋找澳門主權論據的過程		78
中國境內首份外文報刊——《蜜蜂華報》		92

抗戰時期澳門實錄

——介紹《戰時我在澳門的日子》	98
澳門節日中的葡國史	101
葡國日緣起	105
“四·二五”鮮花革命與澳門	107
葡萄牙共和日與澳門	111
葡國授勳歷史悠久	114
漢學家高美士其人其事	119
澳門土生詩人阿德	122
文化浪子 叛逆巨儒	
——悼恩師奧古斯蒂諾教授	127
奧古斯蒂諾周年祭	131
悼托爾加	133
百年大計 千秋功業	
——匡亞明教授的一個夢	135
附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介紹	138
精英薈聚談漢學	140
廣州囚犯的信函	143
葡萄牙人早期對漢學的貢獻	
——兼介紹曾德昭神父《大中華帝國誌》	146
16世紀葡萄牙的中國觀	149
創造新文明	171
路在腳下(跋)	楊允中 174
後記	176

從澳門看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融

知道澳門的人不多，認識澳門的人更少。對澳門略有所聞的人，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賭城形象，是文化沙漠。然而，不少到澳門看過的人卻有截然不同的觀感。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知名學者季羨林先生 1993 年初訪澳門，即留下深刻印象：

“澳門是好地方，面積不大，人口也少，但是卻蜚聲全世。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在 400 多年以前，明代的末葉，歐風東漸的突破口就在這裡。許多赫赫有名的向中國和其他一些東方國家傳播西方的宗教和科技藝術的人物，很多都是先從澳門登岸，然後逐漸散向中國內地，直至中國的首都北京。鼎鼎大名的利瑪竇就是其中之一。到了清末，孫中山在這裡呆過。了解西方的維新之士，比如鄭觀應等，也在這裡住過。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當時彈丸之地的澳門，仍然是東西雙方互相了解的窗口”（李觀鼎《邊鼓集》序文——《我的祝福》，澳門基金會 1996 年 5 月版）。

事實上，隨着澳門近十多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對外交流日漸增強，國內外學者、尤其是港澳問題研究者已改變往日只著眼香港的現象，開始關注澳門，重新考察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澳門作為中國看世界、世界看中國的一扇窗口，曾經為中西

文明的溝通起過重要的作用。13 歲自澳門登船赴美求學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回憶當年在澳門的所見所聞時說，“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從澳門看中西方文明早期的碰撞和交融，不無歷史和現實意義。

中外交往，秦漢時期業已開始，西漢王朝還與大秦（羅馬帝國）建立了間接聯繫。繼之而起的絲綢之路，更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繁忙的國際商路之一。然而，真正促成貫通中西文明全方位大規模交流的，還是 15 世紀分別在中國和葡萄牙發生的兩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鄭和七下西洋和葡萄牙的航海大發現運動。

明帝國建立後，在朱元璋“安養生息”的治國政策下，國內經濟經 30 年即迅速恢復發展至繁盛，對外政策也從明太祖“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患中國者，不可輒自興兵”以防為主，演變為明成祖“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的積極對外開放、睦鄰友好，依“厚往薄來”原則發展朝貢貿易。鄭和自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六年（1432）七下西洋，便是此一政策的具體表現和自然結果，“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既可提高通過“靖難之役”奪取皇位的永樂帝的個人威望，收拾國內民心，又能“昭示恩威”令“萬邦臣服”，並順便在南洋一帶探聽被廢黜的建文帝的下落。

地處歐洲西南角、瀕臨大西洋的葡萄牙，是最早穩定政治疆界的歐洲民族國家之一。1143 年唐·阿豐素·恩里克斯（D. Afonso Henriques）稱王立國後，在歐洲十字軍騎士團的援助下，往南征服

向摩爾人收復被佔據的土地，至 1250 年葡萄牙人佔領了整個阿爾加維(Algarve)地區，建立永久的疆界。葡萄牙經過幾個世紀的獨立政治生活，形成了一個單一的民族社會，但是，國內社會矛盾重重，平民起義和貴族政爭此起彼落，經濟也入不敷出，向外擴張，拓展新資源，安定社會局勢，便變得理所當然且勢在必行。正如葡萄牙史學家薩拉依瓦(J. H. Saraiva)在其《葡萄牙簡史》中所說，“擴張運動是由於國內找不到有理想報酬的就業機會而引起的一場向外遷移的運動”，此一運動既有助於解決國內種種矛盾，又在客觀上符合各個社會階級的利益：

“對於人民來說，擴張主要是一種移民形式，對他們來說擴張和移民意義相同：追求較好的生活條件和擺脫壓迫制度。這種壓迫是十分沉重的，老百姓想逃脫這種壓迫，尋找新的土地，12 世紀發生的向南部遷移就是國內的第一次擴張。對於教士和貴族來說，擴張意味著傳播基督教和佔領土地；傳播基督教和佔領土地是為上帝和國王效勞的形式，是贏得相應的報酬如俸祿、封地、官職的形式，而這些機遇在葡萄牙這個狹小的宗主國裡是越來越難得的。對於商人來說，擴張意味著生意前景興隆，意味著他們可以在產地購買原料和高價轉賣。對於國王來說，擴張是提高威望的機會，使貴族們有事可幹，更重要的是可以開辟新的財源，特別是在國王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時刻”。

弱小的葡萄牙往東佔領鄰國領土的可能性微之又微，因此，很